

白居易诗文的广泛传播现象与语用修辞特征研究*

张厚远** · 陈汝东***

目 录

1. 研究的缘由
2. 白居易诗文的广泛传播现象研究
 - 1) 在唐朝不同的社交圈层里被广泛传播
 - 2) 在海外华文圈内备受推崇
 - 3) 白居易诗文在欧美的传播与影响
3. 白居易诗文的语用修辞特征研究
 - 1) “通民情，达君恩”语用修辞现象建构了一个共通语义空间
 - 2) 丰富的文采和简约的叙事风格形成了内生性的传播张力
 - 3) “美刺”风格再现了当时要求社会改良的政治性诉求
 - 4) 以情动人和以诚感人的语用修辞风格
4. 语用修辞与传播交流的切合性

1. 研究的缘由

随着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应用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公民的交往频次和交往质量都在逐步提高，世界的整体性趋势愈加明显，异质性文化的共通性和交融性的特性更加凸显出来，传承并创造出更加优秀的民族文化几乎成了各国共识。

文学作品因其强烈的艺术性和抒情性而格外受人关注，对社会影响巨大，它的传播和修辞越来越为世人关注，传播的首要因素在于“通”，修辞的首要因素在于“变”。传播的“通”指的尽量减少传播过程中的各种阻碍，让信息本身和信

* 基金项目：2018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境外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政治文化安全的影响研究”成果（立项号：18NDJC288YB）

**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副教授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息蕴含着的意义顺利地传达到信息接受者那里；修辞的“变”指的是信息生产者运用多种适切的话语技术生产出恰当的传播内容，使信息接受者接受到信息之后能产生思维或情感上的认同性变化。南朝著名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精辟地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四大“通变”特征。第一，映射时代精神：“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第二，贯通古今人情世故：“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第三，增强环境适应性：“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第四，提高心物相通性：“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

之所以选择白居易的诗文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他的诗文在儒家文化圈里流传很广，在欧美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很强势的传播现象与他诗文的语用修辞特征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它可以为当今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更好地传承古典文化提供一种比较新颖的思考范式，启发大家从语用修辞的角度看待古典文化精神的传承，准确理解古典文化所蕴含着的丰富的思想，顺便矫正当前网络流行文化精神匮乏的“空心化”思潮。

2. 白居易诗文的广泛传播现象研究

1) 在唐朝不同的社交圈层里被广泛传播

社交圈层的主要功能是给人类的社交活动提供一个具有普遍共享性的社交空间，供大家自由分享信息，寻找各自所需的内容。由于社会群体具有阶层性的社会性特征，那么，社交空间也就具有了与阶层性相适应的层级性特征，每个层级的社交空间都有各自不动的话语修辞方式、话语修辞目的和话语修辞功能。与其它朝代相比，唐朝社会的高自由度特性决定了其言论与思想的低控制

性，从而奠定了唐朝社会文化兴盛和精神昂扬的时代基础。唐朝社会的社交空间比较开放，彼此之间的相融性很强，在文学创作交流的活动中，舆论的规制性较弱。所以，在群星灿烂的唐代文坛上，不乏李白、韩愈这样影响巨大的大家，也有贾岛、李贺这样的苦吟诗人和鬼才诗人。从传播影响力和接受美学的角度看，白居易的诗文更加具有公共性价值，质感很强，能够真实地表现出当时社会的场景性和逼真性，更容易被理解、被接受。因此，在不同的话语场，不同的时代，白居易的诗文都能成为热门话题，雅俗共赏。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自述道：“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诗试赋判，传为准则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慙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1)”上至知识精英，下至“士庶、僧徒、孀妇、处女”和“倡妓”，都能理解白居易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意象和意境，并作为抒发个人感情、传达个人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也作为寻求共鸣性和同道人的重要媒介。可以说，在白居易当时的社会场景中，其诗文内容的强联结属性在不同阶层的社交空间里都能充分地显现出来。从深度上来说，其诗文的话语活性强、适用性强，符号的可解释性强、象征性强，“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诗试赋判”，“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从传播广度上来说，其诗文的扩张力强、共融性强，传播的密度高、可渗透性高，“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

白居易的略带自谦自贬含义的自述不是自夸之词，当时另一位诗人、政治

1)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第9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白居易的诗文均选自此书，不再逐一注释）

家元稹的叙述佐证了当时白诗盛传的盛况：“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诵。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²⁾。

2) 在海外华文圈内备受推崇

史料记载，白诗刚写出来不久就能远播他国，声誉很高，在对象国社交空间的活跃度不亚于中国。日本、朝鲜（新罗）、越南（日南）、契丹等国，都有大量的传写白居易诗文的活动。契丹国王多次亲自将白居易的诗翻译成契丹文字，诏见番臣诵读，日本嵯峨天皇也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把他们藏在秘府，常常暗自吟诵，品味含义。

自日本平安时代之前，白居易的诗文就传入了日本，日本《江谈抄》记载了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年间《白氏文集》就已经被皇帝私藏：“《白氏文集》一本诗，渡来在御所，尤被秘藏。³⁾”《白氏文集》里也记载了他的文集传到日本、朝鲜半岛的史实：“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⁴⁾”。《白氏文集》里还曾谈到《白氏文集》的另外一个版本也传到了日本：“会昌四年五月二日夜，奉为日本国僧惠萼上人写此本。且缘匆匆，夜间睡梦，用笔都不堪任，且充草本了。皆疏书内题内也。⁵⁾”据此可以证实：日本人惠萼于公元 844 年入唐时将六十七卷本《白氏文集》写完后带回日本。至今，日本人神田喜一郎的1107年的钞本《白氏文集》现存卷三、卷四两卷现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另据《日本文德天皇实录》记载，日本军官藤原岳守在检查唐朝商人的货船时发现了白居易的《元白诗笔》，呈现给文德天皇的父亲仁明天皇。日本平安时代的著名学者大江维时编撰的《千载佳句》一书中，收

2) [唐]元稹，《元稹集》第555页，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江谈抄』文学第四，为藤原实谦笔条大江匡房谈话说话集，书成于1104—1107年之间

4) 朱金成笺校，《白居易集笺校》，第6册第39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 万曼，《唐集叙录》，第2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录了中日诗人1110首诗歌，有535首诗歌是白居易创作的，排名第一。

吟诵白诗是日本古代宫廷中的一种显示高雅身份的象征，皇室提倡，带头学习、研究，甚至形成了家学。这种高强度的接受性得到了群臣的效仿，于是，白居易文学成为宫廷大臣们必须具备的基本文化修养之一，并形成了专门的学问，讲解白居易的诗文活动成了一种职业和荣耀。从嵯峨天皇开始，学习白居易诗文就被钦定为天皇必学的修身课程，甚至宫廷里还设置了具有世袭特权的侍读官一职，专门讲解《白氏文集》。“大江一族，便屡世垄断着《白氏文集》的侍读职务”；“自大江千古伊始，至大江匡衡止，祖孙五代，在宫廷相继向天皇进讲《白氏文集》近一百年，世代相袭，连绵不绝。”⁶⁾

日本作家紫式部深受书香家风的影响，在白居易的诗文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传世名著《源氏物语》就多次直接或间接引用了白居易的诗文，对日本的后世文化和民族精神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源氏物语》里，紫式部直接引用白居易的诗句、形象或典故，以此塑造自己的艺术形象。书中涉及的白居易的诗篇有四十七篇，引用次数达百余次，而且运用自如，用法神妙，毫无生硬之感。”⁷⁾

多种史料记载，日本的中古时代还出现了象“白乐天社”、“尚齿会”等几十种专门结社，出现了蔚为大观的“白体诗”，研习白居易诗文、学写白诗成为一种时尚，从根本上推动了日本汉诗诗风的变革，甚至引起了以天皇为首的整个日本官僚知识阶层人士心灵上的震动。

据日本情报研究所数据库的检索发现：“截至2018年2月7日，署名白居易的诗集、选集以及文集的日语翻译本、注释本共有195种，其中以日本著名汉学家冈村繁翻译、注释的《白氏文集》（12卷）影响最大，全日本有528家图书馆收藏，收录在明志书院1988年出版的‘新释汉文大系’丛书中。”⁸⁾

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白居易诗文何时传入韩国，但是，高丽时期文人作品中已经有了不少借鉴白居易诗文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以李奎报和林惟正为

6) 严绍璁，「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第87页，1984年第2期

7) 许虎一，「〈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歌」，《延边大学学报》第52页，1983年第2期

8) 何明星、俞悦，「白居易的诗对世界的影响」，《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2月28日

代表的和白诗和集句诗创作上，他们所借鉴的多是白居易晚年的作品。李奎报（1169-1241）在《书白乐天集后》中对白居易诗文在高丽的广泛传播作比较详细的描述：“予尝以为，残年老境，消日之乐，莫如读白乐天诗……白公诗，读不滞口。其辞平淡和易，意若对面谆谆告者，虽不见时事，想亲睹之也，是亦一家体也。古之人或以白公诗颇涉浅近，有以嗟喏翁目之者，此必诗人相轻之说耳。何必尔也。其若琵琶行、长恨歌，当时已盛传华夷，至于乐工倡伎，以不学此歌行为耻……9”

虽然白居易诗歌在韩国的影响不如其在日本影响大，但总的来说，韩国人对于白居易诗歌总体上也是持肯定、赞赏的态度。韩国文人汉诗水平普遍很高，他们特别推崇白居易诗歌体现出的人生体悟和他本人的闲逸之作、贬谪之作。另外，由于白居易诗歌“浅白易懂”的修辞特征而被韩国文人推崇的，高丽时期散文家崔滋（1188-1260）在其《补闲集》中便强调了白居易诗对于新学诗者的启迪作用：“凡新学诗，欲壮其气力，虽不读可矣，若搢绅先觉，闲居览阅，乐天忘忧，非白诗莫可。古人以白公为人才者，盖其辞和易，言风俗叙物理甚的于人情也。10”韩国古代对汉字与汉诗有着较为深入的学习，韩国古代诗人喜欢学习汉诗的写作技巧，皇室、朝廷士大夫等贵族阶级习惯于把汉字作为主要的交流方式，甚至把作汉诗当作一种贵族身份的象征。白居易诗歌传入后，对韩国汉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韩国文人特别喜欢使用白诗集句、白诗用典、化用白诗和唱和白诗的方式进行诗歌创作。韩国的《东文选》内收录了林惟正的46首324句的集句诗，其中有27句用的是白诗集句，其集句诗《秋日有作》可以为证：“身闲何处最相宜，秋雨梧桐叶落时。凉吹已成团扇恨，夕阳催就小窗诗。人间祸福愚难料，世上艰难醉不知。坐久欲醒还酩酊，碧天残月映花枝。11”

这首诗的首联、颈联、尾联都有白居易诗句，分别是“秋雨梧桐叶落时”

9) 金宽雄, 『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 第189页, 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05

10) 曹顺庆主编, 『东方文论选』, 第871页,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11) [韩]许兴植, 『高丽的东亚西亚诗文学-百家衣集』, 韩国:民族社, 2009

（出自《长恨歌》）、“人间祸福愚难料”（出自《戊申岁暮咏怀三首》）、“坐久欲醒还酩酊”（出自《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其思想和意境都与白居易诗歌息息相通，表现出作者闲适恬淡的生活情怀。

古代韩国文人作品里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白居易的形象：安分知足的政府官员、经常受到打击的知识分子、虔诚信仰佛教的信徒、喜欢养妓怡情的遁世者。大多数人都对白居易的为人处世持肯定态度。在朝鲜时期，还曾经出现过深受白居易诗歌影响的新诗体“效乐天体”，主要以拟作的方式学习白居易诗歌的精神与形式。

3) 白居易诗文的在欧美的传播与影响

笔者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手段检索了世界图书馆平台后发现：署名为“白居易”的英译作品共有189种，包括他的诗歌选本、他的专集、依据他的诗作改编的戏剧和小说等。其中，阿瑟·韦利翻译的白居易诗歌译本最多，全世界共有1200多家图书馆收藏了他翻译的白居易的作品，有72家图书馆收藏了《白居易诗选200首》这本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了著名汉学家华兹生研究与翻译的《白居易诗选》，大数据信息显示：全世界有324家图书馆收藏了这本书。美国著名诗人大卫·辛顿非常钟爱白居易诗歌的审美意境、优美文笔和丰富的想象，全世界有255家图书馆收藏了他翻译出版的白居易的作品。一位美国读者于2010年2月8日在大卫·辛顿翻译的《白居易诗选》后面留言中写道：“我大约是在十年前知道白居易的，从此之后，我就对他的诗歌着了迷。白居易是一名唐代官员，他的诗抒写自然世界与静谧的美，也写过辛辣讽刺社会的诗作。白居易的诗歌世界超越了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在1000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还有谁像白居易一样具有这种超越时空的力量。¹²⁾”

12) 何明星、俞悦，「白居易的诗对世界的影响」，『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02月28日

根据大数据信息检索的结果发现：法语是最早翻译白居易诗歌的西方语种，目前共有13种包括白居易诗歌、文集和作品改编的专集出版。德国有31种署名作者为“白居易”的德文版专集。“根据社科院凌彰的研究，德国汉学家勒·沃奇在1925年就出版了专著《中国诗人与思想家白居易的叙事诗》；德国表现主义诗人埃伦施泰因于1923年出版了改译成为德文的《白居易》，于1924年出版了《中国控诉——3000年革命的中国诗歌的意译》，仿译了白居易9首诗歌。¹³⁾”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海外学者和读者非常喜欢白居易诗歌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诗文的语用修辞功能。何明星和俞悦在研究了白居易的诗对世界的影响之后这样评价白居易诗歌：“这种广泛传播的动力，来自于白居易诗歌平易通俗的诗句后面所蕴含的‘心中唯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的拳拳之心。¹⁴⁾”日本汉学家猪口笃志总结了白诗在日本流行的五个原因，其中有两个跟修辞有关：“白诗通俗晓畅，朗朗上口。白诗数量众多，取材广泛，涉及各个阶层的生活，此外词汇丰富，可以成为为诗为文的典范。¹⁵⁾”另外一位汉学家太田次男的研究拓宽了猪口笃志所述的语用修辞范围，进一步深入到了白诗所表现出来的为官之道和个人品格上：“白诗传入我国以来，其势已经远超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白诗文风朴实，简明易懂，数量众多。我国文人在为官之道上，与白居易产生共鸣，对其诗也自然顶礼膜拜。其诗内容使人惊叹，让人倍感新鲜。¹⁶⁾”笔者认为：白居易的诗歌不仅语言浅白易懂、意境优美，而且用他饱含深情的文字真实地再现社会现实，生动地表现出中唐时期的政治生态与民生艰难。从传播学的角度上讲，其诗文传播内容丰富广泛、真实具体，价值观中正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无论对于统治阶级集团还是对于平民百姓而言，都具有很高的研习价值和借鉴价值，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容易建构起和谐共鸣的传播通道，传播流程顺畅。

13) 何明星、俞悦，「白居易的诗对世界的影响」，『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02月28日

14) 何明星、俞悦，「白居易的诗对世界的影响」，『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02月28日

15) [日]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第142页，东京，角川书店，1984

16) [日]太田次男，「从〈千载佳句〉到〈和汉朗咏集〉——以白诗为中心」，第240页，『和汉比较文学丛书四-“中古文学和汉文学2”』，东京，汲古书院，1987

3. 白居易诗文的语用修辞特征研究

1) “通民情，达君恩”的语用修辞现象建构了一个共通的语义空间

语义空间是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顺利实现编码和解码的一个重要场域，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结合体，内在的意义必须通过合适的符号形式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符号体系是一种语言体系，语言是用来传达意义的，语言和意义凝结在一起形成了特定的语义空间，语义空间的大小与语言的清晰度和意义的深刻性成正比例，而传播活动既在社会空间运行、也在语义空间运行。传播得以顺利实现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传者和受者必须拥有共通的语义空间，要么对符号含义拥有共同的理解，要么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否则，就“传不通”，或招来误解。

社会信息的传播伴随着人的精神活动，包括：情绪、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它是一种将个人或少数人所独有的信息转化为多人共享信息的过程，既是交流、交换，也是扩散、影响。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传受双方表述的内容和采用的态度、情感、措辞等，必须能够反映共通的价值观，既能表现出各自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又能拥有一个共通的语义空间。

在《新乐府序》中，他提出了文章“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主张，反对“因文而文”和“淫辞丽藻”，反对齐梁“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注重文章的社会功能。他继承了“诗言志”、诗“兴观群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诗文的信息传递功能，并在《新乐府序》作出了集中阐述：“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他的主张在客观上拓展了文学发展的多样性空间，也奠定了他诗文的易传播、易接受的多功能特征。

白居易认为：“且古之为文者，上以弇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讯

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议文章》）。他建议设立“采诗官”制度：“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采诗》）。为此他专门作了《采诗官》一诗，高度肯定诗歌的信息传递功能，以及这种信息传递功能对于政治文化制度、舆论管理、社会治理和国家兴衰而言，具有重要作用。“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谏议。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员屐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闥。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远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

白居易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通民情，达君恩”是白居易诗文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他的诗文语用修辞的主要目的之一。作为儒者，白居易具有“兼济天下”的人文情怀，他的实现“兼济天下”理想的重要方式就是社会改良。在他的语用修辞价值观里，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让“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白居易时代的社会矛盾还没有发展到革命性的行动阶段，社会改良是当时社会心理的主流。很明显，白居易的实现社会改良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诗文的形式来影响社会，酝酿改良行动。中唐时期的国力已经开始由盛转衰，社会阶层固化，国内矛盾尖锐，经济走向衰退，百姓生活十分困苦。于是，他和好朋友元稹一起倡导“新乐府运动”，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让诗歌具有“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的舆论引导功能，贴近现实，纾解矛盾。这样，也就形成了他的功能性语用修辞风格，他的“心中唯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诗句准确地概况了他的诗歌语用修辞功能。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以“童子解吟

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诗句评价白居易的诗歌艺术特征。事实上，白居易通过语用修辞的功能完成了建立一个“通民情，达君恩”的共通的语义空间的理想。当然，在这个共通的语义空间里，除了好的传播内容，还需要具有内生性的传播张力和适宜传播的叙事风格。

2) 丰富的文采和简约的叙事风格形成了内生性的传播张力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明“文”是文学作品中的核心生命力之一，“文”能使作品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白居易的诗文“辞约而意丰”，融审美性和易接受性为一体，既满足了读者的审美，又降低了接受者译码的难度，自然而然地拓展了传播的公共空间。

他的诗歌语言精粹、通俗易懂，明白晓畅，韵律感强，是经过反复锤炼的语言艺术。一般情况下，白居易的诗歌文采丰富、叙事简约、意蕴深远，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他的三首“忆江南”恰切地代表了他的这一特征。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其一）”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其二）”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其三）”

这组词寥寥数十字，分别写了江南的春景、秋色和人物活动，前后照应，脉络贯通。视野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审美活动从远景鸟瞰到近景作画，再到人物的精心描摹，寻味无穷而又清风扑面，不饰雕琢，传达出高雅的审美享受，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很好体现了他的“丰富的文采”和“简约的叙事风格”这种特色。在《长恨歌》里，作者使用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用精炼的语言成功塑造了杨玉环的优美形象，浓烈的抒情贯穿于简洁

叙事的全过程，情、景、理完美结合，音节和谐，句式骈散相间，全诗生动流转，风情摇曳，极富艺术感染力。清代诗人赵翼评价说：“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¹⁷⁾这些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令人荡气回肠，爱不释手。“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琵琶女》则脍炙人口，采用明线、暗线相结合的修辞方法，把歌女的悲惨遭遇和作者的仕途坎坷进行情感联结。一种是市井生活，一种是权贵生活，二者结合起来，不仅拓宽了诗歌的表现空间、丰富了诗歌的内涵，而且增加了受众的广度和传播影响力。曲折感人的故事在深沉的抒情过程中得到了完美叙述，语言华美而不浮躁、精炼而不晦涩，内容贴近生活，具有广阔的社会性，雅俗共赏，很容易引起多数人的共鸣。“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诗坛也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白居易自小时学诗起，就一直追求语言质朴通俗，议论明白易懂，写事真实无夸，传情发自内心。在形式上，他坚持流利畅达的语言风格，所以，他有很多诗歌都具有歌谣色彩。这种真实可信、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的文风，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传播力和影响力很强。

当然，白诗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与白居易写诗的辛苦认真息息相关，为了追求文采的丰富和叙事的简约风格，他常会呕心沥血地精心修改。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通鉴》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歌的手稿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¹⁸⁾”，他的诗文的通俗艺术是一种“以浅达深”的艺

17) [清]赵翼，《瓠北诗话卷四白香山诗》，第1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术境界，能富有质感地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纯净纯真，减少了内容接受者“误读”或“错读”的概率。

3) “美刺”风格再现了当时要求社会改良的政治性诉求

中国古代士人集团始终都有民本思想，孔子将其概括为“仁”学，主张惠民畏民、为政以德，“仁”学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文士集团，北宋的理学家张载将其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¹⁹⁾”。士人集团的社会责任意识非常强烈，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哲学，他们常用的方式就是劝谏，甚至以死谏上。白居易秉承了正直文人的责任意识，与别人的劝谏行为相比，他不但劝谏皇帝，还讽刺、劝勉其他腐败官吏。他的劝谏的主要目的是让统治阶级认识到当时严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劝谏统治阶级通过“轻徭薄赋”的方式减少社会矛盾。

白居易著名的“苦宫市也”诗《卖炭翁》是他这方面风格的重要代表，陈寅恪曾经这样评价：“宫市者，乃贞元末年最为病民之政，宜乐天《新乐府》中有此一篇。且其事又为乐天所得亲有见闻者，故此篇之摹写，极生动之致也。……更有可论者，此篇径直铺叙，与史文所载者不殊，而篇末不著己身之议论，微与其他者篇有异，然其感慨亦自见也。²⁰⁾”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作者在诗中成功运用白描修辞手法，表现出宫市的残暴掠夺给劳动人民带

18) [清]彭定求，『唐代诗歌总集』，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19) [宋]张载，『张载集』，第3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版

20)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来的深重苦难。诗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非常细腻、逼真，通过一个卖炭老人的身世、磨难、烧炭、卖炭以及炭车被抢的前后经过，向人们讲述一个催人涕下的悲剧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阶级对立的严峻现实，这种修辞手法很容易激起读者强烈的爱憎感情，产生情绪积累效应。卖炭老人的辛苦、贫困、衰老、遭难的外貌，使人见之同情，思之痛心。老人瑟缩、委曲、矛盾、希求的心理描写深刻、细腻，让人倍生同情之心。这样，就栩栩如生地反衬出宫廷掠夺者贪婪残暴的丑恶，暗示出唐朝中期的吏治腐败、民不聊生、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暗藏着重大社会危机。在白居易的诗歌谱系中，这种“观风俗，知得失”的“美刺”修辞手法代表了当时有良知的士人集团强烈要求社会改良的政治性诉求。

与之形成呼应的是他的十首组诗《秦中吟》，组诗所描写的现象都是诗人在长安所见所闻的真事。采用“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首》其二)的语用修辞方法，他将那一时期人民生活的困苦与贪官污吏们豪奢的生活加以对比，集中暴露官场的腐败和权贵们的骄横奢侈，以及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买花》使用对比手法痛切针砭了贵族花市“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残酷现实。《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白居易善于从纷繁的各类真人真事中选取最典型的事物，“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语言通俗，平易近人，言简意丰，对比鲜明。以实现“惩恶劝善”、“炯戒讽喻”、“补察时政”的目的。

因为他常常以诗文为载体，传播自己的“美政”理念，所以，他的劝勉讽刺行为被后人称为“美刺”。在《秦中吟序》中，他自叙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在《与元九书》中，他说：“自

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这里的“直歌其事”和“多询时务”所表现的就是他思想境界里的劝谏作风和责任意识。所以，当他“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时，就“手请谏纸”，除“启奏之外”，凡“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目的是“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结果导致“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常常“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虽然如此，他还是始终不懈地坚持着劝勉统治者“善其身”、“善其政”的“美政”理想。他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他认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²¹⁾”

4) 以情动人和以诚感人的语用修辞风格

白居易的诗文重情尚义，为诗歌注入了“情”和“义”的传播元素，扩充了他的诗文的传播张力。在《与元九书》的第三段，他论述了情、言、声、义的重要性及其关联性。他认为，“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并以“三皇五帝”为例，论证他们当时以“言”和“声”传递其“情”和“义”的德行，结果是天下大治。与杜甫一样，白居易非常崇尚“三皇五帝”的“仁”政之道。需要指出的是，白居易所重的情主要是指人性中的“人情”，除了包括君臣、朋友、同僚、官民和亲人之间的感情外，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各种温情等。他推崇“情一”、“情交”、“情见”，并且要“经之以六义”、“纬之以五音”，认为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做到“直道而行，垂拱而理”。

这里，略举几个例子，可以“管中窥豹”。

写兄弟情深，“故园望断欲如何？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

写恋人相思，“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

21)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214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栏杆独自愁。”（《寄湘灵》）

写夫妻同心，“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黔娄固穷士，妻贤忘其贫。冀缺一农夫，妻敬俨如宾。陶潜不营生，翟氏自爨薪。梁鸿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至此千载后，传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间，不能忘其身。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缁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赠内》）

写思乡，“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长相思二首》）

写友情，“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古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凉州。”（《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这种人情是以浓厚的生命体验为基础的，有显著的东方文化特色的高强度的伦理道德属性，充满真性情和生命力，容易引起情感共鸣和共识，具有热传播的舆论特点。这是白居易独具特色的语用修辞，卓立文坛千年，海内外影响深远。

4. 语用修辞与传播交流的切合性

传播的目的是为了精准地交流意见、寻求“合意”，凝聚共识，从而实现社交圈层或社交族群间的观点融合和价值趋同，顺利解决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实现这个目的的前提是语言的准确编码和解码、减少语言在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噪音”和“阻隔”。译码过程其实就是意义互现的过程，由于多种原因，在人类交流与传播中的实践过程中，译码过程常常会出现认知与理解的多义性，给“合意”的准确度带来困难。一般而言，语言符号的概括性是造成语言符号多义性的主要原因之一，语言符号越抽象，人们对它理解的自由幅度就越大，也就越容易产生意义理解上的偏差，甚至产生完全不理解的现象。这样的交流活动收效甚微，甚至是无效，这就对语言的语用修辞提出了高层次的要求。事实上，通俗

易懂、形象生动、逼真反映现实的内容更具有传通属性，比如童话故事、音乐、影视动画等。

白居易生活在一个传播媒介并不发达的时代，然而他的作品在当时却广为传播，至今在海内外还历久弥新，这与他一贯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是不可分割的。他提出了文章“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的主张，拓宽了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功能价值，为语用修辞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从语用修辞研究的角度来看，文字符号既具有静态意义，也具有动态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信息接受者在理解古代语言文字的时候，需要结合古代的语境来理解它的静态意义，也要结合时代特征来理解它的动态意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语言文字的语用修辞所赋予的多种功能，准确理解跨时代、跨文化传播的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蕴含着的丰富思想。

白居易诗文经历了一个从古代到当代、从中国到海外的连续不断的热传过程，这种热传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其诗文修辞本身具有的热传播属性和信息接受者信息选择的主动性。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华文化圈层内，因其文化特质的近似性，白居易诗文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不仅具有很强的审美鉴赏性，还有很高的文化活态性、思想熏陶性和政治实用性。

参考文献

-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
-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辛文房·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朱金成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白居易,『白氏長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周勛初,『唐語林校証』,北京:中華書局,1997.
- 陳寅恪,『元白詩箋証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 謝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 白居易,『白香山詩集』,揚州:廣陵書社,2012.
- 謝思炜,『白居易集綜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 曹順慶,『東方文論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 張中宇,『白居易<長恨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日)后藤昭雄,『江談抄中外抄富家語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東京:岩波書店,1997.
- (日)清少納言,于雷譯,『枕草子』,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日)紫式部著,丰子愷譯,『源氏物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 (日)市河寬齋編,『日本詩紀』,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
- (日)中西進,馬興國譯,『源氏物語与白樂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 (韓)孫八洲,「韓國文學与白居易」,『東岳語文論集』,(第7輯),1971.
- (韓)金卿,「高麗、朝鮮時代士人對白居易的“受容”及其意義」,『文學遺產』,06期,1995.
- (韓)金卿東、劉維治,「韓國的白居易研究概況及有關問題」,『周口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01期,2002年第19卷.

- 嚴紹盪,「白居易文學在日本中古韻文史上的地位和意義」,『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2期,1984.
- 蹇長春,「年來中國白居易研究述略」,『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03期,1993.
- 劉小俊,「古典和歌對白居易詩歌借鑒一例」,『日語學習與研究』,03期,2003.
- 郭偉,「從“詩話叢林”看朝鮮詩人對白居易的接」,『黃岡師範學院學報』,08期,2015.
- 李劍亮,「論韓國詞對唐宋詞的受容——以“歷代韓國詞總集”為文獻依據」,『詞學』,01期,2012.
- (日)下定雅弘,「戰后日本白居易研究概況」,『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04期,1989.
- (韓)李奉相,『白居易詩文在韓國傳播與接受』,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會論文,2007.
- (日)渡邊伏子,『“白氏文集”在日本平安時代的接受情況』,浙江大學博士學會論文,2012.

Abstract

Study on the Widespread Phenomenon and Pragmatic Rhetorical Features of BaiJuyi's Poems

Zhang, Houyuan · Chen, Rudong

BaiJuyi's poems reflected the mirror image of a passionate Confucian during theTang Dynasty's transition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His literary wordsclearly flashed the thoughts of Buddhism and Taoism in the scholar class at thetime.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pirit of multi-cultural tolerance, opennessand enterprising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His claim that"Articles are written for the times, poems are written for the currentaffairs" clearly illustrates the purpose of pragmatics.The pragmatic rhetoric of his poems has formed a unique texture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works: clear thinking, clear and fluent language, easy singing and singing, and easy to spread.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the pragmatic rhetoric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oems and to reveal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his poems that can be universally loved by readers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 Bai Juyi'sPoems;Pragmatic Rhetoric;Transmission phenomenon; Cultural heritage; Relevance

투 고 일 : 2020. 1. 10. / 심 사 일 : 2020. 1. 15.~ 2020. 2.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0. 2. 20.